

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推荐
青年出版人
学术丛书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丛书主编◎孙颢 副主编◎曹培章
总策划◎吴士余

镜中之舞

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叙事

郑崇选◎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推荐
青年出版人学术丛书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丛书主编◎孙颢 副主编◎曹培章
总策划◎吴士余

上海青年出版人学术丛书

镜中之舞

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叙事

郑崇选◎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镜中之舞: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叙事/郑崇选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2
ISBN 7-5617-5148-6

I. 镜... II. 郑...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2851 号

镜中之舞——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叙事

著 者 郑崇选
文字编辑 朱妙津
责任校对 邱红穗
封面设计 卢晓红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1.25
字 数 206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 3100
书 号 ISBN 7-5617-5148-6/I·369
定 价 17.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王铁仙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从“五四”至今,已将近一个世纪了。在这百年中,我以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经历了兴盛和深化、起伏与变异、复归和发展三个大的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总的来说是属于复归和发展阶段,但90年代以至今,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中国社会和文化语境迅猛改变。作为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文学必然地受到文化语境的制约和影响,而出现多元的发展态势,与之前的文学状况有很多明显的区别。如何揭示这种区别背后复杂的运作机制,是当代文学批评者必须面对的问题。然而我们可以发现,这样重大的问题在很多时候却被束之高阁,至少是没有受到重视。这可能是出于一个成见,就是不把当下文学的研究看作严谨扎实的学术研究,认为只有基于史料、考证之上的历史研究才能登上学术的大雅之堂。从另一方面看,却可以理解为是对当下文学无能为力、难于把握的一种表现。郑崇选这本专著,则相当细致和系统地描述和揭示了它的整体变化的状貌与深层动因,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中国当代文学在进入90年代之后所发生的异常复杂的变化,不仅仅是指涌现了各种新的文学现象,更重要的是文学的整体境遇所发生的变化,而只有全面准确地把握了当代中国的文化状况,才有可能揭示这种变化及其原因。郑崇选敏锐地感觉到了消费文化对于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选择消费文化作为切入点,透过消费文化这面无处不在的镜像,从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学生产方式、文学观念、传播方式、新的文学形式、文学表现内容、文学的未来命运等几个方面一一揭示了消费文化对于当代文学发展的深层渗透。他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分析了大量的文学事实,论述了许多问题,他不凌空蹈虚,不穿凿附会,提出了诸如“消费准意识形态的形成”、“文学的非消费性特征”、“女性叙事的消费化”、“网络文学成为消费文化的符码”、“文学叙事的符号化”、“叙事空间的转移遮蔽了真实的社会生活”、“文学叙事的不可替代”等重要的观点。这些观点,无一不是理论与现实充分交融的产物,很多认识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颇具警示意义,有的还是有前瞻性的。

当代关于消费文化的理论首先是在欧美国家出现的,这是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在90年代之后的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很多与西方消费社会相仿的社会和文化现象,这给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的传入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于是,有关消费文化的诸种理论便成为近年来一个理论热点。但是相当一批中国学人,尤其是中青年学人,脱离本土的实际现象和内在原因,一味套用西方的理论,似乎离开了西方的学术话语就无话可说,甚至日益陷于理论游戏的泥潭之中,与我们真实的社会文化生活相隔甚远。郑崇选这本《镜中之舞》,努力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书中虽然大量引述了西方理论,但都是建立在鉴别和批判的基础上的运用,是充分考虑了中国语境之后的一种理性的选择,所提出的观点都抓住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各种症结。这是因为,郑崇选出生于河南农村,后又辗转各地求学,社会基层的阅历、人事的历练,使他对当代中国的现实状况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同时又出于对文学的挚爱,长期关注和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因而他能够打破外来理论的隔阂,穿过种种的社会表象,对当代文学做出切实的分析和深层的挖掘,这是难能可贵的。

郑崇选认定,文学具有人学和审美的双重本质。这决定了他的基本立场和批评的思路。他认为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文学观不仅无助于当代文学的发展,相反会使其堕入消费文化的汪洋大海,变成转瞬即逝的消费品。《镜中之舞》所体现出的文学观念正是对人和审美的双重坚持,他由此论述了消费文化对于当代文学方方面面的渗透性影响,和当代文学在两个层面所遭遇到的扭曲和摧折。从他那些或者热情洋溢或者客观冷静的文字中,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对文学发自内心的关注和细密的审视,而不是将文学观相对化、虚无化、概念化,使活生生的文学沦为文化研究的注脚和例证。他看似热心于大的问题,其实始终着眼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并不大而无当。在当代文学发展日益复杂的背景下,这样的著作是有益的,它起码可以廓清文学的一些基本认识,使人较为准确地理解当今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此前,郑崇选阅读了许多文学作品,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调研了很多社会和文化现象,不断地对当代新的文学和文化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发表了一些相关的论文(有的为权威报刊资料转载),实际上是为本书的写作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书稿写成后,在上海出版系统学术著作的众多候选书稿中脱颖而出,得到评审委员会的认可,被推荐出版,并得到颇高的评价。今年秋,他从书稿中抽出一小片断改写的文章,还被评为上海市第四届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的优秀论文,并作了专题报告。

郑崇选是2002年的9月开始跟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在三年的读书生活及之后一年多的工作中,我看到他一直孜孜不倦,广泛阅览各类书籍,乐于思考一些前沿课

题,又很认真、踏实,文风也健康、清新,并表现出颇强的文字表达能力。我觉得他是很有潜力的,相信他在自己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会越走越宽,越走越远,会不断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

江曾培

《镜中之舞》是部当代文学研究论著,阅后感觉有几点比较突出:

它选取的论述角度,是“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叙事”,抓住了纠缠当前文学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显示了作者的敏锐。

它重点探讨的问题:如何认识中国语境内的消费文化?如何认识消费文化逻辑对文学产生的整体渗透?如何认识消费文化镜像之中当代文学所呈现的种种叙事转变?如何认识消费文化语境内文学发展的未来命运?确是当前文学在消费文化笼罩下产生的一些最富困惑性的问题,读后有搔到痒处之感。作者没有“绕着问题走”,显示了学术的勇气。

它的论述具有理论结合实际的色彩,既运用引述了中外学者的有关论述,又以当代众多文学作品作了分析例证,有虚有实,没有那种“玩概念”或一味堆砌材料的弊端。它显示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有着比较结实的准备,是下了功夫的。

它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见解的论断,在论著最后,作者写道:“在当代消费文化的操控下,文学的消费性正在成为一种独断的价值标准,挤压和排斥着文学的社会和审美价值,从而使文学叙事逐渐沦落为普通的文化消费品,日益丧失了与真实和历史的深刻联系,更谈不上精神超越的可能了。……我们理应在文化消费化的潮流中,大力地彰扬文学非消费性的一面,建立一种区别于消费机制的文学生产模式,提倡文学叙事在精神和思想上的独创性和原创性。”这是作者的基本观点,可以说点中了当前文学发展的“穴位”。

当然,从更高的要求上来说,论著的深度还可以作些努力。特别是对如何“建立一种区别于消费机制的文学生产模式”,目前语焉不详,希望作者继续追踪实践的发展,作进一步的探讨。

总的说来,我以为此论著言之有物,富有创见,是本有特色有意义的书稿,反映了上海青年出版人在学术研究上的执著追求与可喜成就,令人高兴。

序一	王铁仙	1
序二	江曾培	4
绪论		1
第一章 消费文化与中国语境		12
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文化转型		12
二、消费文化的界定与当代中国的消费文化		16
三、当代消费文化的文化逻辑		21
第二章 大众传媒与文学生产方式的转变		24
一、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化生产		25
二、文学生产方式的转变		30
三、媒体批评的消费化		41
第三章 影像时代的叙事危机		48
一、影像消费的崛起		48
二、影像化叙事:寄生与呼应		52
三、不可替代的文学叙事		61
第四章 网络文学:当代消费文化的符码		67
一、网络文化的兴起与网络文学的产生		67
二、网络文学的消费性症候		70
三、当文学遇到网络		81

第五章 欲望叙事中的生存迷失	86
一、欲望叙事的消费性	86
二、无根与异化的欲望生存	94
三、知识分子形象的消费转型	101
第六章 女性叙事的新变	109
一、被消费的身体写作	110
二、合谋之后的坠落	120
三、生存探寻的未竟之路	126
第七章 叙事空间的转移	131
一、城市空间的凸显	131
二、“全球化”的文学想象	138
三、两种叙事缺陷	144
余论	153
参考书目	164
中文著作参考书目	164
中文译著参考书目	167
英文主要参考书目	170
后记	171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设步伐越来越快,特别是到了 90 年代的末期和 21 世纪初期,市场经济更是得到了初步的确立。所谓市场经济的初步确立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商品化正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二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运动的展开。在这两个方面合力的冲击下,消费文化开始为市场经济中生存的个人提供自我确认的依据,同时也带来这样一个悖论:在极大限度地实现个体自由的同时也消解着每一个个体的个性内涵。人的生存境遇变得更加复杂,人的可能意义的实现变得更加困难,而作为“人学”的文学也开始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表征危机”。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在 20 世纪后半期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经历了一个异常曲折复杂的过程。每一个亲历者或阅读者,都会感叹当代文学经历过的动荡和变化。现在已经是 21 世纪的第五个年头了,当我们再一次注目当代文学,我们又一次感到了它的不可捉摸和无从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在世纪之交的消费文化语境中,异常醒目地发生着巨大的裂变,而在裂变之中又一轮文学总体特征的转型也正在悄然启动。

文学作品是文化领域内一个独特的意义系统,文学的发展不能不受到时代文化语境的影响和制约,同时它也必然以自己的方式呼应着社会文化的整体面貌。如今我们似乎不得不面对一个改变的现实世界,也许任何一次的改变都不如现在的这种改变来得彻底。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充当着社会思想代言者的角色,每一次的社会变革总是会在文学作品中得到最早的反映,它以宏大的现代性寓言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对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文学始终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是一次又一次的文学事件和一部又一部的文学作品,成为凝聚各种社会话语的公共领域,文学一直占据着人们精神生活的中心。然而,随着 20 世纪末消费文化的兴起,这样的一种状况却渐渐地成为一种残留的回忆,中国当代文学从社会结构的中心地带向边缘区域滑落,成为这个年代的一种边缘性叙述话语。消费时代的文化

语境借历史与市场的大手,使文学退居社会一隅,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消费社会的一部分,它从生产到传播到阅读都消费化了。文学开始和其他商品一样,成为一种消费品,越来越远离民族国家的现代构建以及社会个人的价值选择,文学不再能创造时代的共同理想,但消费式的写作和阅读却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大众的欲望想象。于是,如何争取更多消费者的巨大动力,无形中决定了这一时代的文学生产面貌。置身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关于文学发展的内外部特征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消费文化成为当代文学新的生存处境与写作处境,文学的生产主体不再是单纯的作家,市场和读者也部分地参与了文学的生产,由此,文学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表现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不同以往的新变,在整个的社会文化系统中,文学显现出来的外在特征再也不如过去那样清晰。同时文化语境的转型也投射和影响了文学内部特征的变化,文学的价值取向、文学风尚、叙事特征、文学观念都在或隐或显地呼应着文化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剧变,从而呈现出新的美学质素。

本书的题目使用“镜中之舞”,以此隐喻消费文化语境中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总体特征。“镜中之舞”之谓首先得之于拉康“镜像”理论的启示,按照拉康的看法,镜像阶段是人类心理发展、人类与世界关系的一个必经阶段,同时也是人类的一种认同方式。正是在这个阶段,幼儿通过镜中的形象,第一次实现着自我认同的过程。“在这个模式中,‘我’突进成一种首要的形式;以后在他人的认同过程的辩证关系中,‘我’才客观化;以后,语言才给‘我’重建起在普遍性中的主体功能。”^①可见,“镜像阶段”对于人类的主体性的觉醒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自我认同是在幻象中完成的,也就是说镜中的形象并不就是真的自己,而是虚幻的理想形象,人的主体性的形成是在镜中形象不断地调整之中形成的,如果沉溺于虚幻的镜像阶段,人就很可能在异化中走向精神分裂。我所使用的镜像概念被置放到了一个更大的社会语境中,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所形成的社会文化结构,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镜像,笼罩着整个生活世界,文学无疑也处在这个巨大的镜像之中,它通过自己的方式进行着自我认同的努力。

在消费文化所形成的镜像之中,符号逐渐成为社会流通的主要形式,“为了构成消费的对象,物必须成为符号”^②。消费时代把一切变成商品,又把一切商品变成符号,一切商品只有变成文化符号才能够被顺利消费。过去被理解为物质实在的社会“现实”,现在已经为符号的加速传播所遮蔽,“现实”也只有变成符号才能进入社会

① 拉康:《拉康选集》,诸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0页。

② 马克·波斯特编:《让·鲍德里亚文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英文版,第25页。

绪 论

的传播领域,才能被人们理解和把握。而在符号的背后,现实本身被遮蔽和遗忘了,现实已经没有什么本质可言,人们不需要现实,也无法真实地把握现实。这些符号体系是否是某种真实的指代已经不太重要——它们有时甚至与真实失去了联系,符号本身成了自我指涉的主体,符号所拥有的交换价值大规模地倾入经济流通领域,制造了人们永无休止的消费欲望并渗透进了一切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显然,符号化的文化逻辑根源于人们价值需求的转型,在消费社会中,消费对象成为一个整体性的意义符号象征体系,正是由于消费对象所具有的符号象征意义,使人们对于消费对象的使用价值需求转向了“为欲望而欲望”的需求,“从而过去意义上为满足需求的消费转化成为满足欲望的消费,亦即对欲望本身的消费”^①。这样一种价值取向的转型对于人类的生活世界和社会文化的塑造都产生了内在而深刻的影响,它消弭了原来基于理性精神维度上建立起来的人的主体性,消费逐渐成了新的唯一的彰显个性、自我认同的文化依据。个体在消费中有意无意地遵从着消费文化霸权所制造的各种“符号”,从中印证个体在社会中的身份,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个体对个人自主性、自我界定、真实的生活个人完善的需求,都转变成了占有和消费市场所提供商品的需求”^②。消费文化所提供的物质和文化产品成为个体生命存在的前提,脱离消费语境或无法进入一定的消费语境,个体的自我认同就会发生危机,人类已经陷入消费时代所制造的“符号之阵”中而无力自拔。在这个意义上,“镜中之舞”成为消费文化语境中所有文化产品的宿命,艺术家们制造着大量的文化符号,而正是在这样一个符号的世界中,在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广义的“镜像”之中,自我才得以折射、认同以至重建。然而这些符号只是“镜像”中虚无缥缈的舞蹈,它和真实的生活和人类的历史永远隔着一层,重建个体与历史的整体性就显得艰难无比。

社会价值需求的转型必然会影响到或支配文化产品的生产输出,从而引起新的文化话语方式的产生。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感性直观的影像成为新的文化主导话语,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化媒介的转换,更是人类审美心理结构和社会文化范式的变化,其影响辐射到文化领域的诸多层面,包括艺术形式、审美接受、文化思潮等等。影像话语的泛滥带来的是以制造形象为目的的文化形式的大行其道,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电影、电视、网络、动漫、游戏等文化产业的迅速崛起,并很快成为人们主要的文化需求。而以线形的、概念化的、抽象的语言作为媒介的文学却在逐渐萎缩,以至不时出现“文学终结论”的夸张论调。另外一个方面,影像话语制造了社会各个领域

① 陈昕:《消费文化:鲍德里亚如是说》,《读书》1999年第8期。

②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张旭东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2—233页。

的审美化“形象”，对于“形象”的需要成为人们塑造生活方式的主要手段。而关于“形象”的制造领域已远远不止于文化艺术领域，甚至成为各种产业推销商品的一种主要手段，发生在购物中心、饭店、公园、个人住宅等各个场所。“形象”只强调商品的展示和摆设，它使商品与其使用价值分离开来，变成一种独立自足的符号体系，最终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艺术品。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韦尔施就指出：“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闻的被美化的世界里，装饰与时尚随处可见。它们从个人的外表延伸到城市和公共场所，从经济学延伸到生态学。”^①这是一个审美化的世界，美学的神奇诱惑无处不在。韦尔施甚至认为，今天的社会公共空间“已经过度审美化……在我们的公共空间中，没有一块街砖，没有一柄门把手，的确没有哪个公共场所逃过了这场审美化的蔓延。‘让生活更好’是昨日的格言，今天它变成了‘让生活、购物、交流与睡眠更美化’”^②。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取消了艺术和日常生活的界限，艺术不再是单独的、孤立的现实，它进入了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因而一切事物，即使是日常事物或者平庸的现实，都可以归于艺术的旗号之下，成为审美的对象。换句话说，文学性的叙事策略已经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商品形象和各种媒体信息的生产都运用了大量的文学性手段，诸如广告、促销活动与形形色色的媒体炒作等等。而“广告”可谓是最为极端的消费文学，它将虚构、隐喻、戏剧表演、浪漫抒情和仿真叙事等文学手段运用得淋漓尽致，“它把罗曼蒂克、珍奇异宝、欲望、美、成功、共同体、科学进步与舒适生活等等各种意象附着于肥皂、洗衣机、摩托车及酒精饮品等平庸的消费品之上”^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性的蔓延和泛滥也是不容置疑的文化事实。

“文学终结论”和文学性的蔓延看似是互相冲突的两种现象，然而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中却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共同揭示了文学在消费文化“镜像”之中，日益走入一条逼仄的羊肠小道，使本来清晰无比的面目变得日益模糊。面对这样的文学现实，文学研究也面临了巨大的挑战，我们既要努力从泛滥的审美符号中辨认出真正的文学存在，又要从大量的消费文学文本中揭示出它们的缺陷和匮乏，从而促进文学在当下和以后的健康发展。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当代，作为一个成熟的文学研究者必须保持对文化运作机制的高度敏感，同时又必须熟悉文学本身的审美独特性。在现实的文学研究中，能够有机综合这两个方面的少之又少，相反，更多的则是走向研究的两个极端，使我们在当下鲜活的文学现实面前越

① 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

② 同上书，第164页。

③ 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来越迟钝和麻木,一步步陷入失语的境地。因此,在进入本书的正题之前,我想对这两种研究现状先进行一番梳理。

首先,使用比较广泛,也是得到很大范围认可的研究模式是对所谓“纯文学”的坚守,把文学研究的对象固定在文学文本的内部,注重研究作品的语言、修辞、结构、文体特征等方面,认为文学完全独立于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公共领域之外,是一个私人的、纯粹的、自足的美学空间。凡此种种,都不同程度地把文学观念、文学实践和文学作品当作理所当然的现实加以接受,而完全忽视了这种现实在人的头脑中赖以构成的文化条件和历史条件。这样一种文学观和文学研究模式的形成,直接归因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文学批评价值标准。出于对文学长期受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的强烈不满,以及对文学自律、自足和独立的强烈诉求,再加上西方相关理论流派的蜂拥而入,文学“向内转”被大张旗鼓地提出来,并得到了文学研究者和作家们的极力拥护。“向内转”的提出,不仅帮助文学确立了独立的形式地位,而且有效地深入到人的隐秘的内心世界,甚至人的无意识层面,即使在今天,仍有其相当的合理性。“向内转”成为作家创作之时自觉遵守的准则,而文学批评界也开始把“向内转”的创作规律总结为文学批评的标准,于是出现了“纯文学”的提法。“纯文学”刻意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它拒绝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的干预。“纯文学”经过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处理,形成了对文学创作的普遍化要求,而它要求的正是文学对“外部世界”的不再涉足。

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纯文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学观念,不仅有效地控制了具体的文学实践,同时也有效地渗透到了文学批评甚至是文学教育之中。“纯文学”成为衡量作品艺术高下的主要尺度,而文本分析也成为众所周知的批评策略,特别是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对中国文艺理论界的深刻影响,大批理论家共同将语言形容为文学的主角,社会、文化、心理、思想等方面的意义退居次要。“文本是语言编织物,因而文本隐藏了文学的首要秘密。肌理、张力、象征、叙事模式,还有无所不在的结构——一系列新型的理论概念进驻文本,条分缕析,剔精抉微。”^①可以说,这样一种批评方法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一直到现在许多评论家所身体力行的。隐含在这一系列理论概念背后的一个前提即是,文本的结构与外部的历史文化语境无关。

现在看来,“纯文学”的提出在当时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反抗的策略来使用的,它要刻意对抗的是以“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真实是艺术的标

^① 南帆:《符号的角逐》,《天涯》2004 年第 5 期。

准”、“典型性”等为叙事准则的文学批评话语。尽管这种对抗有相当程度上的矫枉过正,然而在这个概念运行初期,它确实为文学自身的现代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它第一次把文学的重点从“写什么”转移到了“怎么写”,为作家的叙事方式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于是出现了“意识流问题”、“元叙事小说”,出现了“内心独白”、“心理分析”、“感官印象”等等一些独立的表达和叙事范畴,作家们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地从外部返回到了本体内部,关于心灵和肉身的有关经验成了言说的主要对象。在“形式即内容”口号的掩护下,作家们的创作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叙事手段。更为重要的是,在对文学形式热情洋溢的探索背后,是作家和知识分子“启蒙”理想的再次生发,一些和人的现代化紧密相关的概念得到了张扬,譬如个人、自由、爱、性、自我等等,“纯文学”不仅要以文学的现代化为目标,更为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促进人的现代化,重新启动被“文革”延宕的思想启蒙。所以,如果我们对“纯文学”这个概念没有偏见的話,我们不能否认“纯文学”概念对文学现代性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它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然而,辩证法是无处不在的。一开始就有某种矫枉过正和先天不足的“纯文学”理论,很快就在时间的冲刷下显出了它的封闭性。随着社会现实的日益复杂和文学观念的变化,“纯文学”这个概念所指向、所反对的那些对立物已经不存在了,因而使得“纯文学”观念产生意义的条件也不存在了,“纯文学”再也不能对当下的社会现实作出充分的发言,并且也不能在艺术探索的层面更进一步,“纯文学”更多的成为一种逃避现实的虚空姿态或者是追求艺术的自我幻象。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纯文学”面目出现的“个人写作”大肆泛滥,渐渐地演变成“写自己”、“写身体”的“私人化写作”,这使得文学与社会的脱节进一步加剧。“私人化写作”对自我有限经验的沉溺导致了大量的复制,不仅完全丧失了“纯文学”提倡之初的反抗性,甚至连艺术的独创性也日益缺乏,很多时候,“私人化写作”变成了可供消费的文化快餐,成了商业文化的一部分。而另外一些坚守文学探索的作家们也渐渐地走入了某种死胡同,在艺术探索中完全忽略了身边的现实,所谓的“纯文学”变得不食人间烟火,成了虚无的“能指”之间没有任何意义的肆意组合。文学的发展迫切需要新的爆破口,重新在与现实的对话中呈现出自身的独特魅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依然坚持原来“纯文学”所提供的理论框架去批评当下的文学创作,很可能对陷于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发展形成一种误导,使文学也成为一种只有装饰和消遣作用的消费符号。

另外一种文学研究的思路就是对内部特征的彻底抛弃,完全转向文学之外的文化和学术研究,把文学文本肢解为可供利用的文化个案来加以使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大批文学研究者相继以不同的方式宣告了自己的学术转向,把文学研

究抛在了一边。他们相当一致地认为,面对当下社会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单纯的文学研究已无济于事,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都必须对社会发言,引导人们去正确认识社会。各个大学的中文系也迅速成立了各自的文化研究所,文学研究者好像在日益疲软的文学研究中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正像南帆在一篇文章的题目所写的:“批评抛下文学享清福去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的衰落和边缘化,不仅是社会文化的强大作用力,同时也和文学研究者的批评立场有很大的关系,相当一部分文学研究者对当下的文学现实丧失了信心,遇到任何问题,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西方的学术理论资源,哈贝马斯怎么说,詹姆逊怎么说,德里达怎么说等等,但却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当下的文学家怎么说。批评家们开始善于根据某些理论框架,炮制各种各样的宏大概念和问题的结论,武断地为当下的问题“开药方”,却忽略了文学文本中所隐含的经验的复杂性以及审美的不可替代性。

文化研究的畸形膨胀必然带来对文学研究的忽视和冷漠,时下的文学文本大多成为文化研究的边角料,一些文学批评者只是在文化研究的分析中才偶尔提到某个文本中的现象作为自己研究的佐证,而真正关注文本的审美、心理、情感、叙事、语言等文学因素的批评几乎很少见到。对社会发言、解决实际问题成了批评家最理直气壮的理由。人们真实的生活、情感和心理再一次被遮蔽,除了一部分可以作为文化研究的表象被反复提及外,文学除了承受来自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巨大压迫外,文学研究者自己的批评错位对之同样造成了重大的挫伤,一部分作家再也找不到从事文学的内心需求,只是在市场和文化研究的左冲右突中生产一些粗鄙的文字。甚至有些刚刚从事文学写作的作家故意迎合文化研究者的需求,写出符合他们需要的所谓社会现实,以期引起批评家们的注意,让他们从中发现可供文化研究的材料,从而走向市场,获取自己的名利。文学的真实性以及超越性离我们越来越远,判断文学作品是否优秀的标准开始置换成文本所谓文化因素的含量,而不再是语言、叙事、审美等文学的内在因素。当下一些文学作品的显著倾向就是审美和情感的粗鄙化,对表象过度关注而没有超越的思考。也许在每一天都有大批的小说问世,然而其中称得上优秀的作品则是微乎其微。而关于文学审美独特性的问题也已经很久没有人再提起了,当下的文学批评大都转换成了文化思想的争论,而具体的文学文本则被束之高阁。东方主义、民族主义、全球化、后殖民等等宏大的概念激起了文学批评者空前的热情,文学本身则成为一种点缀,很多学者为了自己文化研究的需要随意曲解文本的内容,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文化理论的容器。返回“文学自身”曾经作为几代文学家孜孜以求的梦想,让人魂牵梦绕。然而在当下,却很少再有人愿意花时间去作这样的思考,文学的本质好像已经不存在了。一些文化和思想的泡沫正在对文学造成巨

大的伤害,理念性和所谓的文化价值让一些本来大有可为的优秀作家误入歧途,写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时过境迁,我们很难相信这些作品可以作为文学经典流传下去。当下的文学已经真正完成了它的边缘化转变,期待用文学来改造社会、改变诸多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注定是美好的一厢情愿。我想对文学本身来说这并不是坏事,而正是真正做到回归“文学本身”的大好时机。然而当下的创作现状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信心,作家们显然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应付现实的发展,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对不合时宜的道德的鼓吹,便是各种形式的媚俗,能够真正沉于生活之中并写出具有超越性的文本的作家少之又少。消费文化正在日益成为当下社会的主流文化,它正在用各种各样或隐或显的方式改造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旧有的文学观念被一一消解。在文化研究的视域下文学好像成为没有本质的东西,任何一个新的文本我们都可以找到承认它合理性的所谓标准,文学批评和研究不仅没有筛选出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反而促进了劣质作品的大批量生产。

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个人化写作初具规模的时候,我们以为将迎来一个文学自主发展的真正的文学繁荣期,然而发展到现在,我的信心却渐渐地失去了,在我们对文学现代性的期盼中,我们的行为是否是对现代性的最大解构呢?我们真的不再需要审美的感悟、情感的抚慰和心灵的飞翔了吗?也许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创作状况,然而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表象关注以及对文学中非文学因素的强调正是对文学发展的一种消解,它们就像两列背道而驰的火车,永远无法交接。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两种走向不同极端的文学研究方式,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扼杀了文学发展的健康丰富性。那么,如何在复杂的文化语境下尽量呈现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进而对文学今后的发展有所启示呢?我想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展开文学外部和内部的充分“对话”,顾此失彼,或者是对任何一方面的偏执都无益于当下文学的整体理解。一个时代只能提供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文学,我们不可能跨越这个时代去要求它,更不能因此而无视它的存在。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及认知问题的出发点,给我们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首先,我们应该充分了解消费文化转型以来的当代文学的发展事实,任何一个结论的得出必须是建立在对大量具体文本的深刻理解以及文学经验证据的大量采集上;其次,我们必须随时警惕文本背后的文化语境无处不在的制约,这种制约有时甚至会具体到文本内部特征细微的变化,文本生产不仅局限于语言作坊内部,社会历史的具体语境也可能会对文本的每一个细部产生压力。“文学在源源不断地生产。殚精竭虑的构思,天才的想象,汹涌的灵感,美妙的遣词造句,成规隐藏在文学的深部,如同重力一样制约了作家